



总第3辑
2008年第1辑

主 编 李佑新

毛泽东研究

MAO ZE-DONG RESEARCHES

湘潭大学出版社

主编 李佑新

毛泽东研究

MAO ZE-DONG RESEARCHES

湘潭大学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研究. 2008 年. 第 1 辑/ 李佑新主编. —湘潭: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81128-038-8

I. 毛… II. 李… III. 毛泽东思想—理论研究—文集
IV. A8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2884 号

毛泽东研究

2008 年第 1 辑 总第 3 辑

主编 李佑新

责任编辑: 李美华

封面设计: 胡 瑶

出版发行: 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传真): 0732-8298966 邮编: 411105

网 址: <http://xtup.xtu.edu.cn>

印 刷: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邵阳有限公司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7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8-038-8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

主 办

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顾 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克立 石仲泉 李 捷 杨瑞森
沙健孙 沧 南 梁 柱

编委会

主 任 彭国甫

副主任 罗宏书 李佑新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乐夫 王向清 许全兴 李建国
范贤超 唐正芒 唐凯麟 唐洲雁
夏佑新 郭建宁 章育良 熊华源
颜佳华 薛广洲

主 编 李佑新

副主编 王向清 颜佳华 唐正芒

编辑部 王文兵 周锦涛 彭 臻



目 录

学习毛泽东 超越毛泽东	李 捷 (1)
毛泽东引兵井冈的深远历史意义	梁 柱 (20)
毛泽东“实践论”的中国性格	李维武 (30)
毛泽东的实践论与传统知行观的近代嬗变	陈卫平 (47)
毛泽东实践哲学论要	李佑新 (59)
毛泽东实践哲学形成的历史背景与条件	刘景钊 (71)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与湘学的经世务实传统	李佑新 陈 龙 (80)
论社会主义民族化的理论依据	刘建武 (88)
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发展	王向清 (102)
探索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	萧延中 曾子墨 (115)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建树	范湘涛 (134)
罗荣桓与毛泽东的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	肖铁肩 (142)

论肖劲光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贡献	刘 丽 丽(150)
从井冈山到东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方红姣(159)
略论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对“瞒产”的开明态度	唐正芒(166)
建国之初毛泽东对执政规律的探索与实践	熊 辉 谭彩霞(172)
抗战前夕刘少奇对白区党的建设的探索	周锦涛 杨家慧(181)
建国初期毛泽东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思路及启示	唐金培(192)
建国以来缩小城乡差别措施的回顾与展望	
——从政治合法性视角作出的考察	李熠煜(202)
毛泽东有关行政发展路径的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潘信林(211)
近年来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研究综述	刘 阳(218)
近年来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综述	黄华松(230)



学习毛泽东 超越毛泽东

李 捷*

摘 要: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领袖,作为新中国创始人,他身上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概括起来为三种能力两种精神:一是在迷惘中判断形势、把握方向的能力;二是善于总结经验、善于理论思考、善于把握规律、善于把握本质的能力;三是识人、用人、团结人、爱护人的能力;四是不迷信、不盲从,勇于探索、善于探索的精神;五是正确对待挫折、对待失败、对待失误的精神。毛泽东的一生也存在缺点和失误,我们在学习毛泽东的优秀品质的同时,还要从毛泽东身上吸取值得吸取的教训,这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

关键词:毛泽东 能力 精神 教训 学习

毛泽东的话题,是个永恒的话题,说不完的话题。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他的功过是非的评价,在邓小平的主持下,通过党中央的第二个决议作出了郑重的结论。2006年6月30日,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85年间干了三件大事:一是成功地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二是领导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是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在这三件大事当中,前两件大事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取得的。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领袖的地位,作为新中国缔造者的地位,以及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奠基人的地位,都是名垂千古、当之无愧的。薄一波同志有一句很精辟的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于毛,成于邓”。

从今天看,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向毛泽东学习哪些东西呢?概括起来说,也就是三种能力和两种精神。实际上能力和精神是不可分的。要想有超人的能力,就必须要有过人的精神,要有一种很好的精神状态。

* 本文原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作者简介:李 捷(1955—),男,山东平阴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

一 学习毛泽东在迷惘中判断形势、把握方向的能力

一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出现过许多重大发展关头,也出现过许多发展的转折。而在这些时刻,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把态势判断得非常清楚,了然于胸。真正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非凡判断能力的人。

大革命失败后,全党都在思考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也出现了一时间的迷茫。大革命失败后,按照历史的惯性,我们党内的大多数人马上想到的是要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靠国民党已经不行了,国民党已经从我们昔日的盟友变成了我们的敌人。在这一点上,大家都是一致的。所以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作出了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正确决定。在这样的大前提下,中国革命的道路应该怎么走?中国共产党应该把领导中国革命的重心放在哪里?当时,绝大多数的人想到的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总体上来说,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没有错,但把它作为革命的具体模式加以运用,那就要出现问题,而当时我们的党中央就是这样做的,当时的大多数人也是这样认识的。所以,在“八七”会议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就迁到了上海,以周恩来为首的另一部分领导人在此之前转移到了南昌,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南昌起义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走北伐原来走过的那条路,重新回到广东搞出一个根据地,然后重新北伐。这样的一条路是不是可行呢?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南昌起义部队冒着酷暑行军,沿途打了许多硬仗,终于到了汕头,结果共产国际答应提供接济的军火船并没有到。大家非常失望。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后来说的,中国革命要靠谁?要靠自己。外援要争取,但要靠自己。

就在“八七”会议前后,毛泽东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当时是瞿秋白主持中央的工作,准备在会后转移到上海去。他对毛泽东非常敬重。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陈独秀对这个报告是不满意的,而瞿秋白特意为毛泽东的这篇考察报告写了序言,支持把报告印成小册子在武汉出版。瞿秋白征求毛泽东的意见,看是否与他一块到上海去,毛泽东回答说:你们去住你们的高楼大厦,我要到农村去,我要和绿林好汉交朋友。这样才有后面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实践出真知”。毛泽东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初,也没有意识到要自觉地到农村去创建像井冈山这样的革命根据地。当时湖南省委下的命令是要秋收起义的

部队会攻省会长沙,实际上还是搞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暴动。毛泽东是奉命去前方执行这个命令的。但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领导起义的过程中,很快就发现凭借起义军现有的力量,不要说去打省会长沙,就连浏阳这样的县城都攻不下来。下一步怎么办?他说服了大家,下决心最后把起义军剩余的部队集结起来,最后来到了罗霄山脉中段,创建了中国农村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所以,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有一个主观的或者说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东西预先设定在那里,一切都遵此进行。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不是什么先知先觉,而在于他能够在事物的运动中意识到原来的路走不通,要走一条新路。大家都在实践之中,而他能够比其他入更早地发现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找出新的出路。我们判断形势,碰到一种迷惘之后,也同样也需要这样一种精神。但是千万不要把它理想化,不要以为一个事情一来,我们就可以精确地计算到将来会如何。我们的要求是,经过一段实践,力争比较早地作出科学的判断,做出正确的判断,把工作中的盲目性减少到最小。这就是毛泽东给我们的启示。

上了井冈山,开创了根据地,还有一个如何巩固的问题。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如何制定正确的发展方向。这也经过了一个认识过程。起初,毛泽东把整个红军活动的中心一直放在湖南这一边,他最早是看好湘南这一块区域。经过一段时间,他认识到湘军战斗力强,士兵比较彪悍,红军不容易打赢它,所以不能死抱着向湖南发展不放,而要改向江西方面发展。江西这一边敌军战斗力比较弱,江西军阀也无心同红军恋战,基本上是取守势,想割地自保。这给我们红军很大的活动便利。所以毛泽东后来说,我们的战略就是“雷公打豆腐,专挑软的捏”。这样,红军才最后找准了一条生存、发展的方向,就是向湖南取守势、向江西取攻势。对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章中上升到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来认识,就是要利用大大小小的军阀之间的矛盾,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求生存、求发展。这些小块根据地不断扩展,最后汇成革命的洪流,就能够造就迎接革命高潮的中坚力量。所以,没有实践,就没有预见;没有实践,就没有科学的预见。但不是人人都有可能在实践中提出同样的科学预见。这就是毛泽东他所具有的一种非凡的本领。

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同样面临着如何生存与发展的问題。在这样一个十分落后偏远的地方,似乎是已经远离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的地区,怎么能够凭借这样一支弱小的力量在敌人的缝隙中求生存、求发

展?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政治影响,使之波及全国?面对这个问题,党中央在一个方面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中日矛盾将取代国内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因此初到陕北,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就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决定。但是,下一步怎样把这个棋做活,大家的意见就不一致了。有的就主张往新疆方面发展,背靠苏联老大哥,打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这样一种心态在当时来说是正常的,它和八一南昌起义时的失利状况是相吻合的,大家都希望在失利的时候,苏联老大哥能帮助我们。但毛泽东不这样看。毛泽东是主张向东发展,就是要东渡黄河,到山西去。毛泽东指挥打完了直罗镇战役以后,回到瓦窑堡,就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向东发展的完整方案,而且这个方案提出了一个战略思想,叫作“以发展求生存”。对于红军来说,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生存的问题。但要解决生存的问题,必须要有更高的眼光,不能就事论事,要以发展求生存。要发展,就要向东发展。他作了分析,东面的华北地区是中日民族矛盾的一个焦点,也是民族抗日呼声最高涨的地方,同时也是我们高举抗日义旗、有所作为的地方。但是,这个方案提出来以后,党中央内部大多数同志都不赞成。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非常耐心地说服了党中央的多数同志。这个行动一直拖到了 1936 年 2 月份才开始实施。这就是东征。

为了实现向东发展的目标,毛泽东还派刘少奇到北方去重新恢复力量,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有时,中国革命的部署也像下围棋一样,有时是正面突破,有时要迂回包抄,有时要这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刘少奇不负众望,很快就在北平、天津等地搞出一个局面来了,同党中央在陕北的发展遥相呼应。

实际上,东征是一个战略试探。通过这件事,毛泽东又坚信一条,国民党的营垒内部是可以分化的。东征不久就有了周恩来和张学良的“肤施会谈”,这两件事是有内在联系的。这以后,红军在西北逐渐搞成了一个局面,这就是同张学良、杨虎城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大联盟的新局面。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实现了以发展求生存的目标。

通过这样一个西北抗日的大联盟,又进一步验证了我们有力量作到逼蒋抗日。“逼蒋抗日”是张学良在“肤施会谈”中向我们党提出的建议。原来我们的方针一直是做中下层的统一战线,方针是“反蒋抗日”。后来我们采纳了张学良的建议,开始搞上层的统一战线,来孤立蒋介石,逼迫蒋介石抗日。结果搞成了。1936 年 12 月发生的西安事变,最终是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位爱国将领帮助我们实现了逼蒋抗日。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这是策略上的重大转变。没有这个转变,全国性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迅速建立。

这里面又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在社会大变动、大转变的时候,在出现一个新的变局的时候,就要看你有没有迅速地判明形势、当机立断、果断行事的能力。你光在那里判断形势还不行,还要善于在关键的时候在关键的地方助上一臂。西安事变的发生,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没有想到的,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它的酝酿确实是沿着一个历史的轨迹在发展,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它的推动者。而西安事变的发生,极大地推动了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进程。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驾驭形势的能力、驾驭局面的能力,这一点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也有一个判断形势、把握方向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和罗斯福曾经搞了一个秘密的《雅尔塔协定》,实际上确定了维系半个世纪的美苏两极格局。后来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两极格局。在两极格局下,像新中国这样的弱国怎么办?毛泽东认真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就是“中间地带”理论。他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搞东西方冷战的烟幕下,把争夺世界的重点放在广大的中间地带。根据“中间地带”理论,毛泽东作出了“一边倒”的决策,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要紧紧依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样才有我们的国际地位,才有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外部保障。我们应该感谢的是,苏联老大哥在新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的时候,确实给了我们及时的、无私的援助。这一点我们应该是要感谢它,应该承认它的功劳。凡事有利也有弊。对于我们来说不利的是什么呢?就是存在着苏联的战略利益同中国的战略利益的矛盾,事实证明两者难以协调。而我们要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跑,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所以,后来的中苏交恶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必然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只有实行真正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全方位的和平外交,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在中苏交恶以后,我们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发展依托,这就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其实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外交实践的继续。后来,毛泽东把这一理论发展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实践上,我们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依托,到20世纪70年代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随后又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打开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从这里,可以悟出一个道理,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再加上抓住发展中稍纵即逝的机遇,就可以收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二 学习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善于理论思考、善于把握规律、善于把握本质的能力

实践和理论之间,有一座桥梁,那就是总结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不断总结经验、推动理论创新的党。然而,大家都在总结经验,却并不是每个人都善于把经验上升为理论,特别是能把经验的东西上升为规律和本质的东西。为什么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只能是毛泽东呢?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正确的道理,都包含这两个方面。只有毛泽东能够创立毛泽东思想,但是,毛泽东创立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离得开别人的经验吗?同样离不开。从经验上升为理论,由实践创造转化为理论创造,既是集体智慧和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这一群体的杰出代表的思想结晶。这是一个辩证法。

比如讲,毛泽东带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过程中,经过三湾改编初步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但是适合这支人民军队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基本作战原则,这时还没有建立。它的先导和雏形就是著名的“十六字诀”,叫作“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十六字诀”又是怎样总结出来的呢?它就是集合了当时许多方面的经验和智慧。

毛泽东刚到井冈山的时候,并没有马上上井冈山。他先到宁冈去作社会调查,在上山之前先摸清井冈山周围的社会、民情、政治、经济情况。他在调查研究中,得到了一条重要的经验。他后来就跟大家说: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朱聋子打仗很有一套,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作“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这句话启发了毛泽东。他把这句话改造了一下,叫作“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1]229}。军队不会打仗还是不行,但是死打硬拼也不行。应该说,在总结经验方面,毛泽东很有心,也很用心。后来,他又总结井冈山斗争和万安农军打游击战的经验,提出了十二字诀:“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1]232}朱毛会师后,井冈山地区红军的力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第一,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正规部队。八一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由朱德、陈毅率领来到了井冈山,这是人民军队的精华,极大地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使井冈山斗争上了一个层次。这支部队里,有三个将领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这就是朱德、陈毅、林彪。第二,朱德当年在滇军当旅长的时候,曾经驻守四川泸州,在当地清剿土匪,积累了丰富的游击作战经验。这些经验到了井冈山如鱼得水。很快,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共同总结下提出了“十六字诀”^{[1]243}。原先

的“敌来我去”变成了“敌进我退”，后两句“敌驻我扰”、“敌退我追”都没有变，很关键的是在这两句话之间加了第三句话：“敌疲我打”。这句话加进去以后，把原先的“十二字诀”升华了。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不像土匪武装，不是为了占山为王，而是要解放全中国、实现我们的革命理想。光打游击、只图生存，不是红军作战的目的。这“十六字诀”，表面看十分简单，却充满了辩证法，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后来我军一整套战略战术都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

在井冈山斗争时候，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敌人来了，红军就是战斗队。敌人走了，两大战役之间的空隙，红军就成了工作队，深入乡镇做群众的宣传和发动工作。宣传发动工作，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要给贫苦农民以看得见的实惠，毛泽东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土地革命的任务，是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的。但是土地革命怎么搞，包括毛泽东在内谁也没有经验。而且在湘南暴动的时候，为了让农民参加革命武装，当时干了一件蠢事，就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误以为这样做最革命，这些老百姓成了彻底的无产者，就会跟着我们一块闹革命。结果没想到，这把火，把我们和群众隔开了，把很好的群众基础给烧掉了。所以，后来毛泽东总结说：你烧了人家的屋子，人家就要革你的命。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我们开始懂得，要农民跟党走，就要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利益，就要打土豪、分田地，这才是真正的土地革命。如何打土豪、分田地，这又是一个问题。1928年冬，毛泽东总结当时的经验，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后来，毛泽东总结说：“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2]37} 这些错误，通过后来制定的几个土地法逐步改正了。所以说，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件事，也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总结经验，不断纠正错误，才逐渐上了轨道的。

除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还要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这就是当时毛泽东经常强调的“三位一体”。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意识和局部执政经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开始的。应当说，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实践，是同我们党的建军历程、同我们党的建立根据地的历程同步进行的。当时建立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就是茶陵县工农苏维埃政府，主席是谭震林。这样，红军的武装斗争，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这支人民军队同贫苦农民有很好的基础，联接的纽带是土地革命，再加上在党的领导下体现工农当家作主的工农政权的建立，这就使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充满了丰富的内涵。瑞金是共和国的雏形。没有瑞金，中国革命就不

可能从井冈山的涓涓溪水,发展到瑞金时期那样波澜壮阔的宽广的革命。而井冈山的经验,就是瑞金时期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那样一个完备的党政体系的雏形。在种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之中,毛泽东这种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和别人的经验并把它上升成为系统的理论的能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当年,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实事求是地谈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只有采取“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3]98-99},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找到直接的史料来证明,但完全可以相信,毛泽东对方志敏创建的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一定是非常的关注。毛泽东是不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也吸收了方志敏的一些斗争经验,而方志敏是不是也吸收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这还有待于我们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既包括自己的经验,也包括别人的经验,还有许多生动的事例。其中之一,是体现在他开会作决策的方法上。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每次参加中央的会议,包括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一般开会时,他不先发表意见,而是先听别人发表意见。即使是主持会议,他也只是宣布一下会议的主题,然后让大家来说,最后他才讲。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讨论问题,充分发表意见。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遵义会议后逐步形成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每一位成员都具有很高的领导和决策水平,都有丰富的领导经验。他们发表的意见,讲得很多的东西,分析之透彻,提出的对策建议之完备,都是远在平常人之上的。而轮到毛泽东作会议总结的时候,他的分析和判断,又高人一筹。他用几句精辟的话,就能把大家在讨论中的各种好的意见概括起来,并且加以发挥,有理论有实际,有决断有措施,令人心服口服。毛泽东能在中国革命的领袖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的确是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反复选择的。

这里举两个事例。一是重庆谈判的决策。1945 年重庆谈判前夕,为了决定究竟让不让毛泽东同志去,党中央在 8 月 23 日至 26 日四天之内连续开了三次会。大家的意见不一致,有的主张去,有的不主张去,认为这是蒋介石摆的鸿门宴。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战后形势。他几句话这把问题点透了,说:现在是蒋介石想打,美国人、苏联人要和我们和,我们也想和,我们也不想打。究竟是和还是打?现在看来至少在短期内是要和,打不起来。而且,他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明确表示:我还是去。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但是什么事情都要想个万一。所以他建议中央通过一个决定,在毛泽东离开

延安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职务^{[4]11,14-16}。他还说:万一我回不来,就拜托你们把这件事情做好。短短的几句话,非常通俗,把事情交代得透彻清楚。这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二个事例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中央关于外交方针的决策。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公开参加国际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回到北京。7月7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听取周恩来的汇报。在周恩来汇报完了以后,毛泽东讲了两点重要的意见:第一,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大家都希望和平,我们要抓住和平这个口号,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好战分子;第二,现在看来,我们的门要关死是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5]332-335}。这两个判断一出,让大家感到豁然开朗。这实际上是新中国外交方针的一次重要调整。新中国成立前夕,确定的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方针是“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从这时起,我们开始在西方阵营积极寻找外交突破口,最后找到了法国。1964年中法建交,为后来中美关系正常化打开了现实的通道。

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还有一条特别重要的,就是他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成功了总结经验,并不稀奇。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这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大家都知道,毛泽东一天军校也没有上过,但却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战略家、军事家。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人写回忆录,说毛主席是常胜将军。毛泽东自己却说:哪有什么常胜将军!我学打仗是怎么学的?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就是从失败中摸索怎样才能打胜仗。他还说过:我自己指挥的第一仗秋收起义就失败了,这才有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一仗。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还决定由他协助周恩来实施军事指挥。照一般人的理解,这以后中国革命就会一帆风顺了。事实并非如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指挥的第一仗,也就是青冈坡战斗就失利了。当时,毛泽东下决心在土城附近的青冈坡设个埋伏,歼灭尾随红军的川军郭勋祺一部。然而,由于侦察敌情出现了失误,战斗发起以后,起初打得很顺手,但到当天下午敌军增援部队上来后,战斗发生了逆转。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当晚决定同川军脱离接触,西渡赤水河,这才有了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之役。“四渡赤水”,被刘伯承元帅称作妙笔生花、用兵如神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典范。而这个妙笔生花的范例,是从败笔开始的。先有败笔,才有妙笔。其中的关键,就是毛泽东善于从失败中总结成功之道。这个事例告诉我们,作为肩负党和国家发展重任的中高

级领导干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坚韧不拔的心理承受能力,要在思想上时刻做好遭遇挫折、遭遇风险的准备。而且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要有超出常人的承受能力,要有处变不惊、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能力。这里最关键的就是要善于总结,特别是要善于从理论上总结。通过透过现象把握规律、把握本质。

三 学习毛泽东识人、用人、团结人、爱护人的能力

毛泽东在识人、用人、团结人、爱护人方面十分突出。他曾经讲过,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领导者的责任,第一是出主意,其次是用干部。他还把知人善任、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作为我们党的基本组织路线。

这里面有很多的具体事例。比如说,在困境中支持过他的人,是他一辈子不会忘记的人,他一定会在关键的时候保护他。毛泽东对邓小平就是这样。他对邓小平一直是刮目相看、爱护有加的。因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邓小平吃过“左”倾错误“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干部路线的苦头,而毛泽东心里很清楚,邓小平在某种程度上是代他受过。毛泽东一直是把邓小平作为接班人之一来精心培养的。1956 年党的八大的时候,他提名邓小平作党的总书记,曾经这样评价邓小平,说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还特别提到,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6]112}。这个评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考察干部的一些关注点在哪里。当然,毛泽东对邓小平也有不公正的地方,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把他打倒,“文革”后期又错误地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是,在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决心起用邓小平,这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作出这个决断,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承认“文革”整人整错了,就像他后来对邓小平说过的: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另一个是全面内战^{[7]346}。像毛泽东当时在全党全国全军都享有崇高威望的领袖人物,能够这样承认自己在用人问题上有失误,错用了林彪,整错了人,那也是很不寻常的。在 1976 年江青等人利用“天安门事件”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时候,也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批了一句话: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件事从根本上来说,他对邓小平判断错了,但也为后来保留了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非常关键。

以上是党内的,还有党外的,像毛泽东对待章士钊先生。章士钊先生和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先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杨昌济在临终前曾经把毛泽东和蔡和森郑重地托付给章士钊,说:国家要兴,必赖二子!当年毛泽东在北大勤工俭学的时候,参加革

命工作,缺少经费,章士钊就给了毛泽东一千银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章士钊先生特别的关照。“文革”前夕,他的《柳文指要》要出版,康生总在里面作梗,说他是用唯心主义来研究逻辑学和其他问题。毛泽东后来专门写了批示,要中华书局印他的书。这件事几经周折,直到1971年这部书才在中华书局最终出版。这里举出几封关于《柳文指要》出版的信,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民主人士的关心和爱护。其一:“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1965年7月18日致章士钊)^{[8]404}其二:“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22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85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1965年8月5日致康生)^{[8]430}这两封信,前后相隔仅半月,一封是给章士钊本人的,另一封是给意见相左的康生的。对于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来说,做人的工作能够如此苦口婆心,实属不易。

团结干部,爱护干部,就要搞“五湖四海”,就要能容人,有海一样的胸怀。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次大会前夕,毛泽东在预备会上专门就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讲了一番话,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告诫大家要正确对待所谓的不公平、不公正。他这样说:“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6]106}在这篇讲话里,他还专门拿自己的经历作例子。

在这方面,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陈毅元帅的。延安整风的时候,陈毅于1944年3月来到延安,想对毛泽东诉说自己受饶漱石排挤的冤屈。毛泽东对他说:如果你要谈华中抗战的经验,我可以召集个会议,让你谈三天三夜。如果你要谈与饶漱石的问题,我看还是一句话也不要提。毛泽东和陈毅是故交,怕他想不通,还在4月9日专门写信开导他,说:“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碍